

论北凉沮渠氏的佛教功利主义态度

彭建兵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史系,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十六国时期,沮渠氏在河西建立了北凉政权。在沮渠蒙逊父子的推崇下,北凉佛教极为兴盛。一般认为,沮渠氏父子是佛教的虔诚护法者。本文通过对蒙逊父子崇佛活动的考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他们的崇佛在客观上促进了北凉佛教的兴盛,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的佛教功利主义者。

关键词:北凉 沮渠蒙逊父子 佛教 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 B948.2 K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09)07-0071-03

十六国时期,北凉佛教极为兴盛。这显然与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父子的崇佛有密切联系。自公元401年“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的沮渠蒙逊举兵杀段业之后,北凉沮渠氏统治时期就开始了。直到公元460年北凉高昌流亡政权为柔然所灭,北凉统治者无不对佛教表现出一种炙热的宗教热情。这是有史实根据的。其佞佛,“国寺极壮”,其开窟,更是“穷海陆之财”,“殫生民之力”。^[1]¹³³无论沮渠蒙逊还是其子牧犍、无讳及安周无不自称“法王”,礼高僧为国师,广弘佛法。沮渠蒙逊崇佛最盛,史书多有记载。《十六国春秋·北凉录》载蒙逊“蒙逊王有凉土,专弘事佛”。《魏书·释老志》也记载蒙逊“亦好佛法”。凉州高僧道朗在其所撰《大般涅槃经序》中更述蒙逊“每思弘大道,为法城渐”。《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中则不光称“蒙逊素奉大法”,且“志在弘通”。另外,《弘明集》卷十一《何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故事》等史书都述及了蒙逊之崇佛。

蒙逊父子之崇佛^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他们主持、倡导或劝请下翻译并抄写了大量佛经;二是开凿了著名的凉州石窟;三是大修塔寺碑;四是敬重昙无讖等高僧。

一、译经与写经

在北凉,见于史书的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主要有四

次。第一次是在蒙逊定都张掖时,沙门道龚、法众等人于北凉永安年中译出《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大方等陀罗尼经》、《宝梁经》等3部8卷。第二次是在蒙逊定都姑臧时期,由高僧昙无讖主持,于北凉玄始十年(421)至北凉义和三年(433)之间译出《大般涅槃经》36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大云经》4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等佛经。第三次由蒙逊世子兴国主持,昙无讖主译,于北凉玄始十六年(426)在姑臧译出《优婆塞戒经》1部7卷。第四次,由沮渠牧犍主持,天竺沙门佛陀跋摩主译,从永和五年(437)到永和七年(439)译出《大毗婆娑经》1部100卷。除这四次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外,北凉还有一些零星的译经活动,在此不再一一叙述。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北凉时期共译出佛经82部311卷,其中昙无讖贡献最大。据《出三藏记集》载,“昙无讖等在北凉时,译出佛经计十一部一百二十卷。”汤用彤先生称之为“北凉译经之巨子”,^[2]²⁷⁵是对昙无讖佛学贡献的中肯评价。

北凉时期,除大规模译经外,还抄写了大量佛经。从出土文物及相关史料来看,抄写佛经可以说是北凉举国一致的弘法大事。自最高统治者到贵族再到一般民众,都把抄写佛经当作一件神圣大事来恭行。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摆脱苦难获得智慧达到解脱。有学者认为,目前有纪年可考的能确定在高昌出土的北凉写经残本约有400件。^[3]¹⁵³⁻¹⁶⁶其中既有“凉王沮渠安周供养经”,又有

收稿日期 2008-11-12

作者简介 彭建兵(1972-),男,湖南益阳市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敦煌学与中国佛教文化、贵州地方史、历史教材教法。

“贤者董毕狗”供养经，还有“清信士史良奴供养经”。从已公开的北凉写经残本来看，北凉写经内容相当广泛。《妙法莲花经》、《华严经》、《增一阿含经》、《持世经》、《佛说菩萨藏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十二因缘经》、《十住经》等写经残本已在凉州及高昌等地发现。以上北凉写经或辑入《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或散见于国内外各公私藏家手中。

二、开窟造像

北凉统治者开凿了著名的凉州石窟。据《十六国春秋·北凉录》记载，蒙逊“于凉州南百里崖中大造形象，千变万化”。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则进一步叙述蒙逊之开窟造像，“（蒙逊）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牢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燼，苦依立之，效尤所及，又因珠宝终被毁盗”，乃“于州南百里……就西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在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卷二中也有类似记载。据张学荣先生考证，北凉王沮渠蒙逊在“州南百里崖中”所造窟当为武威天梯山石窟。^{[4]49-5} 武威天梯山石窟为中国早期石窟艺术。严耕望先生也认为，“蒙逊石窟寺即在天梯第五山脉中无疑”，且进一步推断石窟开凿时间，“当在晋宋之际，西元四二〇前后。”^{[5]91, 92} 樊锦诗等先生所撰《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一文认为，莫高窟第268、272、275窟为北凉石窟。随着对河西石窟的研究的深入，许多“隐姓埋名”了许久的北凉石窟得到了正确认定。杜斗城先生对北凉石窟断代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撰写的《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关于河西早期石窟的年代问题》等文章认为，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等石窟可能开凿于北凉。他还认为敦煌莫高窟中北凉洞窟除第268、272、275窟外还有第259、254、251、257、263、487、265、437、435、431和248等一批石窟。他是根据早期窟龕的形制、造像、壁画内容以及绘画风格等，再结合有关历史文献来作出判断的。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由此可以断定北凉开窟造像之甚。北凉石窟不仅分布于河西各地，而且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也发现了“凉州模式”^②的石窟。贾应逸先生的研究表明，距高昌故城十五公里的吐峪沟石窟第44窟也是北凉石窟。第44窟虽有一些地方特征，但与莫高窟北凉石窟第268、272、275窟，尤其是与后两窟在形制、空间布局、人物造型、绘画技巧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这说明北凉统治者在其辖地内是积极开窟造像的。

三、大修塔寺碑

修建塔寺、树立功德碑是北凉统治者崇佛的又一力作。造塔是佛教宣扬的功德之一。佛经称，“若人起大塔如来生处，转法轮处，若人取小石为塔，其福等前……以所为同故，故其福无量”。^{[6]580}

有关北凉石塔的情况，王毅、杜斗城、殷光明等先生

作过研究。1977年《文史资料丛书》第1辑王毅先生所撰《北凉石塔》一文中，对北凉高善穆造像塔、白双旦造像塔、马德惠造像塔、田弘造像塔、程段儿造像塔等作过专门研究。杜斗城先生在《北凉佛教研究》一书中对北凉石窟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殷光明先生对保存在敦煌、酒泉等地的北凉石塔也作了专门研究。《文物》1991年第11期殷光明先生所撰《敦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凉石塔》一文称，“在道人□吉德塔”上所刻七佛及一立式菩萨左侧，分别刻有“第一维……，第二式佛，第三随叶佛，第四句秦佛，……第七释加佛……，弥勒佛”等名称，并且石塔上刻有《十二因缘经》佛经片断及发愿文等。可见北凉对于石塔的修造是十分重视的。

为进一步弘传佛法，北凉统治者还建立功德碑。《凉王大沮渠安周功德碑》即为明证。中外著名学者罗振玉、池田温、中村不折、大村西崖等先生对此碑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池田温先生认为，从碑铭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可见北凉高昌政权是崇佛的。他说：“自安周之父蒙逊称霸凉州以来对于佛教的笃信，……除了求得内心的平安外，更重要的是含有作为国家政治的大事而被励行的意义”。^{[7]49} 据有关史料我们可知金塔寺、马蹄寺、文殊寺、竹园寺等均为北凉时雄壮的“国寺”。由此可见，北凉是极重禅修践行的，特别是注重佛塔寺碑的修造。这是符合当时北方偏重修习实践以弘法的历史实际的。

四、崇敬高僧

北凉沮渠蒙逊父子极为敬重高僧大德。沮渠蒙逊尊高僧昙无讖为“圣人”。据《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称，蒙逊“闻讖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昙无讖每以神术验事，“逊益加敬事。”^{[8]78} 蒙逊又优待高僧玄高、法进等人。玄高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集会英豪，发高胜解。”^{[8]411} 蒙逊视他们为“僧宝”，常向其咨询军政要事。沮渠牧犍兄弟循乃父遗风，当政期间无不对高僧优宠有加。据《高僧传》卷十二《法进传》载，法进受蒙逊器重，又为无讳仰赖。我们可以从北魏灭北凉后，沮渠无讳欲西迁高昌，乃问计于法进的行动上判断出法进可能是继昙无讖之后北凉王朝的又一国师。无讳之后，安周既立，“周既事进”。高僧被蒙逊父子当作“僧宝”来供奉，把他们置于“国师”的崇高地位，无非是要利用高僧大德的崇高的宗教威望去实现其统治目标。

北凉统治者为何要极力崇佛呢？我们认为，北凉沮渠蒙逊父子极力推崇佛教，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保证其政权永固。北凉统治者的佞佛，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虔诚的佛教徒，可以说，他们是地道的佛教功利主义者。我们可以从沮渠蒙逊曾毁寺逐僧的举动上判断得出来。《法苑珠林》卷二十一载，“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兴国攻于那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乞弗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至阳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斩数人。尔事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

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战悸,如犯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尤责,登设大会,倍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试想,如果蒙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会轻易下令毁寺逐僧吗?其“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寺逐僧与其“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的前后行为是并不矛盾的,反而更好地说明了北凉统治者对佛教信仰的不坚定以及利用佛教巩固统治的真正目的。佛教自两汉之交由天竺化雪西来,其宣扬的“众生皆苦”、“轮回报应”、“断除欲念”等说教,能够麻痹下层民众,使他们逆来顺受,放弃现实斗争。这不正是北凉统治者所追求的吗?当佛教的教义与统治者的意志惊人的巧合时,佛教就这样被巧妙利用了。北凉统治者意识到,要使政权巩固,必须有和平稳定的国内政治局面。稳定是重要的。而要使社会稳定,必须有顺从的民众。于是,北凉统治者就把佛教作为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了。他们把高僧置于政权智囊团的地位,甚至把他们当作“圣人”、“神仙”来顶礼膜拜,我们已是能够理解的了。池田温先生在《高昌三碑略考》一文中提及的北凉统治者把励行佛教视为国家政治大事的说法,是有充分理由的。

当时的北凉统治者还希望能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于是把佛教又看作不断扩张的精神工具。由于之前有转轮王思想的《转法轮经》的翻译,转轮王思想在西域各国国王心中有一定影响。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蒙逊父子均有当“转轮王”的雄心壮志。^{[9]133}转轮王是古印度民间传说中的圣王。据说此王出世之后,“七宝”相随,转宝导引。凡敌国见之,望风而降,故转轮王可兵不血刃地统一天下。转轮王治世,天下太平。成为转轮王,是世俗国王梦寐以求的。因为转轮王皆为护持佛法之皇帝,故在有些佛典中,又常以“法王”称之。蒙逊父子皆自

称为“法王”,把自己标榜为既能全心全意护持佛法又能治国安民统一天下的“法王”。《凉王沮渠蒙逊功德碑》中多处提及“法王”,第一,在第七行,“法王震命音以移风,大士运四摄以护持”。第二,在十七行,“拯隧三涂,弘道交论。虽曰法王,亦赖辅仁。”更有第十九行,“□□□名。功就宝座,来践法庭。玄珠一曜,亿土皆明。何得何证,利益我生。有感斯应,无求不盈。邈矣哲王,实天修讚。”为了当转轮王,他们“任劳任怨”,以第九行为证,“虽统天理物,日日方机,而庶讥之心,不忘造次。”另外,蒙逊父子还请昙无讖等高僧译出更多具有转轮王思想的佛经,如《金光明经》、《悲华经》、《大集经》及《大方等无想经》等佛经,并且大力抄写之。由此可见北凉统治者利用佛教为其服务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杜斗城先生在其所著《北凉佛教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北凉译经之内容,以转轮王护法思想最有特色,政治意义非常明确”是有深刻道理的。当强大的北魏遣使凉州强索高僧昙无讖并威胁蒙逊“若不遣讖,便即加兵”之时,蒙逊岂肯轻易放弃其“僧宝”?没有这个“僧宝”,他如何做得成一统天下的转轮王?他宁可“与之俱死”,也不发送北魏,终在义和三年(433),当昙无讖西行求法途中将其残酷杀害。一代译师就这样成了政权争斗的牺牲品。从蒙逊之待昙无讖前后迥异的态度中,我们或可看到北凉统治者对待佛教的真正意图。我们认为,沮渠蒙逊父子都是典型的佛教功利主义者。从佛教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佛教并不反对这种功利主义者。这可能就是中国佛教的生存方式吧。当佛教的教义符合统治者的意志时,它努力为其服务;当统治者在疯狂灭法之后又幡然醒悟表现对佛教的崇拜时,佛教会不计前嫌仍然竭诚为其服务。北凉佛教兴盛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吧。

注释:

①关于沮渠蒙逊父子的崇佛活动,杜斗城《北凉佛教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8年)与张学荣、何静珍《论凉州佛教及沮渠蒙逊的崇佛尊儒》,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等先生作了相关研究。

②宿白先生在《凉州石窟遗迹和“北凉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并不是敦煌莫高窟,而是在它东面的武威,即古代凉州地区的天梯山、酒泉文殊山等石窟艺术遗存。他把这种来源于西域龟兹于阗的石窟构造称为“凉州模式”。关于“凉州模式”的相关论文还有古正美先生《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等文章。

参考文献:

[1][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7《历代王臣滞惑解》[M].《大正藏》,52册[Z].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陈国灿.东归吐鲁番文书纪要(三)[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96(14).

[4]张学荣.凉州石窟及有关问题[J].敦煌研究,1993(4).

[5]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M].李启文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37《兴造部》[M].《大正藏》,53册[Z].

[7][日]池田温.高昌三碑略考[J].谢重光,译.敦煌学辑刊,1988(1,2).

[8][梁]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9]杜斗城.北凉译经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